

时代中国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积极作用,对促进中国历史学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价值。^①

社会变迁与历史思潮、史学思潮的递嬗

尤学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社会历史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发展的,其中有“常”有“变”,既有“常中求变”,亦有“变中求常”,表现为二者的辩证发展。社会变迁是“常”与“变”的总相,也是其转换的枢机,因此“通古今之变”成为观察社会变迁的独特视角。每当社会变迁开始萌动与发展时,人们就会思考“常”为何“变”、如何“变”,身处其中又当如何应对与自处,这些思考就形成了各种历史思潮。从根本上说,历史思潮就是人们对社会变迁做出的回应和思考,而当其主体为史家并以史学的形式做出反应时,就形成了史学思潮。就此而言,史学思潮与历史思潮是同源甚至是同一的,所不同者在于思潮的主体和呈现形式有所区别。比如,鸦片战争后兴起的经世致用思潮,既是一股历史思潮,也可视为一股史学思潮。当我们视其为史学思潮时,只不过是从事学这个特定形式和史家这个特定群体去认识它罢了,并不能否认其他社会群体基于同样的文化价值取向所进行的不同于史学的思考与实践,也就是说不能否认其作为历史思潮的性质。基于此,我们可以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认识中国近代的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二者共同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同一性。

—

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是包括史家在内的人们对社会变迁的回应,常与社会变迁共起落。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变迁对人们包括史家提出的要求,二是人们包括史家对这种要求的感知程度以及所能获取的思想与社会资源,三是社会各界对新思潮的认同程度与回应方式。

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既使中国由传统的“天下”格局转向“世界”格局,也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面临着西方强大的冲击。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推力,使中国不能再按原来的轨道发展和原来的方式生存,于是走上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局部到整体、由表面向深层的渐变之路。它呈现的不是那种断裂式的转型,而是一种新陈代谢式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西新旧的关系成为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甚至直至今日不得不面对的基本问题。如何对待传统中国和西方文明,如何对待中国旧传统和西方新文化,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迫使中国人不得不深入思考、做出回应。于是,应变与求变成为时代主题,这是当时的社会变迁对人们提出的要求。应变和求变面临两个亟需回答的问题:一个是“变什么”,即变的起点和对象,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包括传统史学;一个是“怎么变”,即变的方式和前途,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史学向何处去,亦即现代转型问题。

^① 本文受乔治忠关于史学史学科体系研究系列成果的启发良多,如《论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等,并借鉴了其中的某些表述,特此说明并由衷致谢。

对于这两个问题,包括史家在内的中国人是有强烈感知的。无论身属何家何派,他们都贯穿着一种强烈的“求变”意识,都想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迁做出自己的回应,不过他们所能获取的思想与社会资源是不同的,他们的选择也是不同的。

龚自珍和魏源等是较早看清变革不可逆的一批中国人,也是较早具备强烈“求变”意识的中国人。他们积极主张“更法”,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了一系列变革设想,成为中国近代变法维新思潮的先声。在史学领域,他们在严重危机感的驱使下,倡导经世之学,关注边疆史地和当代史,关注外国史地,把研究视野放诸世界,初步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世界意识”,为当时的传统史学带来了新气象,也蔚然形成一股新思潮。不过,他们所能凭借和汲取的思想与社会资源主要是传统的,比如今文经学的变革观念等。所以,他们虽然力主变革,但他们的变革依然是在传统中国的基础之上和框架之内进行,难以形成根本性突破。这一特点在史学上的反映就是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虽然带有一些新气象,但基本还是沿着传统史学的惯性前进,增其新而不变其旧,未能带来质的变化。洋务和维新时期的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基本延续了这一格局,只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不断深化、丰富和拓展新的变革道路和史学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质变进行着量变积累。

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是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宣言。这时的中国在“求变”之路上刚刚经历过戊戌变法的失败,这次失败促使梁启超等人对中国的“求变”之路进行反思。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还未与传统体制彻底断绝关系,甚至还对皇权抱有一丝希望,但以新文化来“开民智、作民气”的主张则更加明确和坚定了。他们意识到,若不用新文化对国民进行改造和动员,则“求变”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梁启超等人要大力倡导“新民”,希望通过改造国民而改造国家与社会。史学成为他们进行国民改造的重要工具,“史界革命”遂起,一面要打倒旧史学,一面要建设“新史学”。旧史学因其理念、范式、宗旨所限,不但不能承担“求变”的时代重任,而且是时代变革的阻碍,所以梁启超要对旧史学进行激烈批判,直言其“四弊”“二病”,彻底否定了传统史学的价值。这种批判虽然在当时有合理性,却有失偏颇,造成了对传统史学的误解,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的断裂。打倒旧史学的目的是建设“新史学”。晚清思想界所能供给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工具是以进化史观为核心的一套史学理论,而梁启超等人的政治经历和文化立场使他们很自然地接受了这套理论,并用以改造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换言之,“新史学”思潮的兴起要放在“求变”的历史思潮和现代转型的社会诉求之下才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通过进化史观,他们塑造了当时中国人的基本历史观念,使中国人开始用历史进步、竞争求存等观念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发展、现实处境和未来前途,唤起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国族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明确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前途。通过批判旧史学而建设“新史学”,史学终于承担起了“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的重任,历史思潮与史学思潮达成了同一。

从史学的角度看,“新史学”是通过与旧史学的决裂兴起的。这种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引起了一部分学人的不满。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其问题,但也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择其精华,称之为国粹,并以保存国粹、发扬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己任,于是形成了一股国粹思潮。他们不赞同采取与传统断裂的方式进行转型,主张立足传统的转型。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并不一概排斥西学,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进化史观的影响,只是他们还未能找到中西融合的有效路径,而对旧学有所偏爱罢了。这股国粹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人文主义史学在思想旨趣和文化立场上颇有相通之处,而抗战时期兴起的爱国主义史学则明确宣称要坚持民族本位文化。

科学实证思潮的兴起也是史家对中国近代“求变”诉求的一种回应。这种思潮以西方科学主义为理论资源,尊奉德国兰克学派的史学思想,追求一种历史学的科学化。他们对科学的热情如此之高,甚至不止把它看作一种方法论,还把它当作一种价值观,从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唯科学主义的倾向。傅斯年宣称要把历史学建成像地质学、生物学那样的学科,就是他们的史学宣言。在对待中国传统的态度上,他们是比较激进的,甚至一度宣称要“全盘西化”。这股思潮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的激烈批判表明,他们希望通过与传统告别的方式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也就是所谓“再造文明”。他们为中国指出的历史前途,则是一种西式现代化。为此,他们要从根本上颠覆旧的史学体系,建设新的科学史学。这就需要从史学的基础——史料入手,用科学方法搜集、整理、研究史料,重建科学的中国史学范式。于是,他们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主张,孜孜于史料考证和古史重建,俨然成为一时主流。

唯物史观思潮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形成,它既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投射,也是中国人“应变”的另一种选择。从萌芽开始,它就与中国社会的变革要求紧密相连。这一思潮的主体是中国的革命者,他们是为了革命的实践而寻求革命理论的指导,这就使唯物史观思潮从一开始就带有明确的现实指向,逐渐形成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特点。他们反对脱离现实的史学,主张用唯物史观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并把认识的成果运用于现实的革命运动,开启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史学道路。他们创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既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思考,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体系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一直延续至今。

这些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得以成型,离不开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界、学界的热烈回应和深度认同,因为“求变”也是他们的诉求,不变则不足以求存。不过,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出于自身的地位和立场,对这些思潮的认同角度、接受方式有所差异,从而使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呈现鲜明的时代性与多样化。龚自珍和魏源等人的变革思想和经世意识得到当时很多人的认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观念深入人心,吹响了走向近代的号角。洋务派、维新派继承、实践和发展了他们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梁启超发出“史界革命”的呼吁,从者如云,进化史观的观念与方法成为思想启蒙的利器,使中国的现代转型由器物、制度到思想,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科学”取代了“格致”,“革命”取代了“保皇”,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政界和学界激起了强烈的回响。他们或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重建民族文化,或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阐释历史前途,造就了多元复杂的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这些情况说明,“应变”与“求变”的共同需求是连接史学与社会、形成思想共识的根由,也是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之所以成“潮”的内在基础。

二

思潮既名为“潮”就有潮起潮落。梁启超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①这就是说,推动史学思潮变动的主因,就是社会变迁以及史学对变迁的回应方式。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面对鸦片战争之后的社会剧变,不同时期的史家做出了不同的回应,形成了连绵起伏的史学思潮。有人将之概括为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国粹主义史学思潮、科学实证史学思潮、新人文主义史学思潮、民族主义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依次递兴,而以科学实证、唯物史观和民族本位文化三大思潮最具影响。^①

综观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涨落,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学回应社会变迁的方式大体有三种。

第一,以经世致用为旨趣,以中学为根基而灌注新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也是史学应对社会变迁、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路径。每逢社会剧变,史家就会发扬这一传统,造就一股经世之风。汉魏如此,隋唐如此,两宋如此,明清之际更是如此。晚清经世致用史学思潮是经世致用传统的延续,只是史家所面对的社会剧变已不同于传统社会,而有了诸多近代元素的挑战。龚自珍和魏源等人虽然意识到了这一挑战的特殊性,但他们赖以应对的却只有传统史学和社会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尽管他们努力为传统史学灌注新知,借以解决现实问题,终究难以从根本上完成史学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时代重任。这种情形在洋务派、维新派那里得到了延续。

继之而起的国粹主义史学思潮宣扬“学即所用,而用即所学”,^②“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为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③具有鲜明的经世取向。他们既坚持传统的“夷夏之辨”而宣扬对清廷的种族革命,也坚持保存国粹、发扬国学而对抗西方的入侵,具有浓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史学在国粹主义思潮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为重要,就像刘师培所说“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④马叙伦更将史学称为“群籍之君”,^⑤章太炎则强调“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有史而不读,是国家之根本先拔矣”。^⑥对他们而言,治史是保存国粹的基本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西学。相反,他们的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地吸收了进化史观、社会学等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其目的在于以西学新知来改造中学,为中国建设独立的近代民族文化。就此而言,他们也有一定程度的中西融合倾向。

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立足于政治,国粹主义史学思潮则立足于文化。他们都主张中国本位文化,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西学,融合度呈现逐渐深化的趋向。不过,随着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不断深入传播,这两股思潮逐渐被科学实证等史学思潮所取代。

第二,以西学构建科学史学,以史学转型为社会转型奠定历史观念基础。“新史学”思潮和科学实证思潮是这一方式的主要代表,它们都是西学冲击下的产物。这两股思潮的代表性史家均有西学背景,其史学理论体系也有清晰的西学渊源,具有明显的以西学改造中学的倾向。这两股思潮所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总体一致,但又具有阶段性差异。“新史学”思潮兴起时,是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初兴阶段。有研究者指出,大致从1902年起,中国出现了一股放弃“格致”而改用“科学”的潮流,这意味着中国知识系统的现代转型。^⑦这正好与1902年《新史学》的发表保持一致,事实上,梁启超从这时也开始用分科之学的“科学”来取代此前使用的“格致”,建设科学史学这一学术目标已经被初步提出。“新史学”思潮更多地吸收了孔德、巴克尔、斯宾塞和日本文明史学的社会进化论观点,着力于

① 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上册,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7—18页。

② 邓实《国粹学报第一周年纪念辞(并叙)》,《国粹学报》第2卷第1期,1906年2月。

③ 王联曾记《章太炎论今日切要之学》,《中法大学月刊》第5卷第5期,1934年10月。

④ 刘光汉《论古学出于史官论》,《国粹学报》第1卷第1期,1905年2月。

⑤ 马叙伦《史界大同说》,《政艺通报》第2卷第15号,1903年9月。

⑥ 太炎先生讲、诸祖耿记《历史之重要》,《制言》第55期,1939年8月。

⑦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341页。

借助人类历史进化的“公理公例”确定中国在进化序列中的位置、判定中国的状态、寻找救国的路径。于是,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君史与民史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历史叙事出现了,而其背后隐藏的是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对立,“新史学”思潮的目标则是把传统中国改造成西方那样的现代民族国家。进化史观对晚清中国所处的弱肉强食的世界有很好的解释力,指出了改造传统中国的路径,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关于近代的历史观念。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号召,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全面展开,并深入包括史学在内的各个学术领域,就像胡适所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①于是,建设科学史学成为一个明确的学术目标,科学实证史学思潮随之而起。科学实证思潮不仅是要用科学方法来改造中国史学,使史学现代化,更要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胡适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目标确定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②所谓“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都是手段或路径,“再造文明”才是目的。他们所研究的问题包罗万象,就史学而言主要是用科学方法来整理、考证文献和史实。他们所输入的学理,主要是兰克的客观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等西方理论与方法。他们所整理的国故,主要着眼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价值,却反对其所承载的道德价值。他们所期望的文明,主要是一种西式文明。这股思潮改变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改变了国人认识世界和社会的方式,推动了国人历史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转型,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转型过程中,科学史学功不可没。

第三,融合中西,在史学与现实的互动中持续推进中国现代转型。科学实证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态度引起了部分学者的不满,认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会断绝中华文化的最后一线生机。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之根本已经动摇,“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以为吾国新社会群治之基。如是则国粹不失,欧化亦成,所谓造成新文化,融合东西两大文明之奇功,或可企致”。^③也就是说,融合中西文明之精华是他们为中国文化指出的明路。那么,如何融合呢?把握欧化与传统之间的“程准”就十分重要。^④他们认为,要以“适用于吾国”为“程准”,审视西方文明而取其“真文化”之代表。什么才是“适用”呢?“‘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如雨露肥料之于植物然。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以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也就是从西学中汲取“能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质者”。^⑤所谓“不相背驰”“截长以补短”“救吾国之弊”,都说明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就像“植物”与“雨露肥料”的关系,若无“植物”,则“雨露肥料”将无所施。与科学实证思潮注重史学的知识价值不同,他们更注重史学的人文价值,强调以史学提升人们观察世务、应付人生的能力。他们并不反对科学,认为史学包含着科学的成分,也积极参与史学的科学化进程,但其宗旨在于科学与人文的会通,使中国文化获得重生。这一取向与现代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实证思潮对社会变迁的回应主要着眼于文化建设,唯物史观思潮则着眼

①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第2—3页。

②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

③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节录留美学生季报)》,《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④ 李思纯《论文化》,《学衡》第22期,1923年10月。

⑤ 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学衡》第8期,1922年8月。

于以政治实践为中心的整体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一种西方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基础。当它的历史基础转换为中国历史时,就面临着解释中国历史的适用性问题。事实上,当唯物史观在中国迅速传播之时,确实遭遇了“削足适履”之讥,批评者对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同时受到质疑的还有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治史方法与能力。面对这些质疑和批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深度融合,增强其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力,拓展唯物史观的历史基础,造就了以李大钊、郭沫若等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史学要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性著作;另一方面运用史学研究的成果回答现实问题,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目标、纲领、路线等重大问题提供历史支撑,通过史学与现实的互动夯实了唯物史观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使以唯物史观为主要理论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深度介入了中国革命进程,他们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阐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用阶级斗争理论阐释了中国革命的动力,用社会形态理论阐释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史学与政治有了至为紧密的关系。

中国近代各种史学思潮的涨落断续,始终与社会变迁的节奏保持一致,并使其与历史思潮保持明显的同一性。这也说明史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不能只从史学内部去解释,还必须将其置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之中。史学思潮对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意义主要在于塑造学术生态,形成文化趋向。大体说来,中西融合、学术独立、爱国主义、民族本位是几种主要的文化趋向,这些趋向在各种思潮中存在着程度、形式等差异。当时代需求凸显时,它引导包括史家在内的各界人士去认识这种需求,思考如何回应需求,并将之付诸实践。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力量、各个要素的互动,从而造就了一种学术生态。这就为史学流派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三

史学流派既是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的产物,也是其重要的推动者。关于中国近代史学流派,历来众说纷纭。蔡尚思提出正统、怀疑、扬弃三派之说,^①周予同先提出泥古、疑古、考古、释古四派之说,^②后改为史观和史料两大派,^③钱穆提出传统(记诵)、革新(宣传)、科学(考订)三派之说,^④齐思和提出掌故派和社会史观派两大类型。^⑤这些说法或以对待古史的态度划分,或以研究方法为准,或以治史特点为据,不一而足。有学者根据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演变,提出了国粹派、科学方法派、新考证派、古史辨派、食货派、禹贡派、战国策派、民族本位文化派、唯物史观派等说法。^⑥

一个学派的形成,往往有其首创者和核心人物。他对时代变迁有敏锐的感知力,有突出的“求变”意识,勇于提出时代命题,并提出对时代命题的思考,呼吁时人认识这些命题,解决这些命题,以回应社会变迁的要求。在他的呼吁和倡导下,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他的理念,思考他提出的问题,采取实际的行动,逐渐形成了时代风潮,形成了相应的学术生态,也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学派。从这个意

① 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1940年版,“自序”第2页。

② 周予同《纬讖中的皇与帝》,《暨南学报》第1卷第1号,1936年2月。

③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

④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引论”第3页。

⑤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大中》第1卷第1期,1946年1月。

⑥ 胡逢祥等《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1840—1949)》上册,第21页。

义上说,一个学派的开创者既是“时势所造之英雄”,也是“造时势之英雄”。这一点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新史学”思潮的首倡者,梁启超在经历“戊戌维新”的失败后,把“求变”重心从政治实践转向文化建设,“新史学”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史界革命”所倡导的历史观念革命是改造国民观念、建设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得到了当时学界的热切响应,一大批史家服膺梁启超的倡导,服膺进化史观,并投入旧史学的批判和新史学的建设。所以,若把活跃在“新史学”思潮中的这些史家称为新史学派,似乎并不为过。

学派的形成基于共同的学术命题、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共同的学术方法,以及这些命题、理念与方法的传承。共同的学术命题往往是对历史思潮和史学思潮发展中提出的社会问题的学术化和具体化,通过对这些命题的连续讨论和独特认知使之成为学派的标志性思想成果。共同的学术理念和共同的学术方法是学派的思想纽带,也是学派认同的基础,而这些学术理念和方法往往会成为一个学派的身份标志。比如,古史辨派的形成是科学实证史学思潮的产物,它的学术目标其实是建设可靠的中国古史系统。古史系统和古史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特殊地位,它构建了中国传统的文明起源、族群历史与构成、王朝世系等一系列作为文化基础的历史观念,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根基。科学实证思潮既然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对传统古史系统的批判自然就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学术命题,因为只有批判甚至颠覆这一系统,才能从根本上抽掉传统文化的历史基础,而代之以历史的科学基础。这样对中国古史系统的批判就不止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命题,而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部分了。古史辨派运用历史演进法,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彻底打破了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古史系统,造成了古史认知的“大地震”,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很大助力,推进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这也成为古史辨派的身份标志。从目标来说,古史辨派是“始于疑而终于信”,所以面对所谓“有破坏而无建设”的指责时,顾颉刚辩解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与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①在他看来,用科学方法对古代史料史事进行考辨,既是打破对传统古史系统的迷信,又为建立科学的古史系统奠定根基。他虽然宣称“疑古并不能自成一派”,^②但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史家在学术命题、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传承上体现的特点,足以使古史辨派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了。

不同的史学思潮会造就不同的学派,同一史学思潮之下,也会因为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方式的差异、史学取向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学派。比如,科学实证史学思潮就孕育了以胡适、傅斯年等为代表的科学方法派,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新考证派。这恰恰说明社会变迁、史学思潮与学派的内在逻辑关系。

历史思潮、史学思潮与史学流派是共生共存的关系,思潮为学派的形成创造学术生态和社会环境,学派则为思潮涨落提供内驱与推动,二者的消长共同受制于社会的变迁。这说明史学的发展要与社会变迁保持同步,及时回应社会需求,方可立于时代潮头,引领时代方向,保持史学的学术地位,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价值。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廉敏)

① 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顾颉刚先生序”,第19页。

②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